

鲁迅研究论文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江鲁迅研究学会编

都是我们研究鲁迅应当郑重对待的课题。我们紧紧地掌握住学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这个大方向，把握新时代的精神，联系着伟大四化建设的实际，遵守各项工作的规律，这样不论在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思想工作、对人民的教育作用上，就是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上，肯定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乐于把这本论文集，作为新的起点，呈献于读者之前，而更大的进展和收获，在于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的精神，脚踏实地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了。

本书的编选工作，由省鲁迅研究学会领导下的编辑小组具体负责。选文范围限于提交省鲁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这次讨论会在我省的学术活动中可说是盛况空前的，共收到论文一百二十六篇，编辑小组按内容分类，从中选出初目，并寄请原作者修改加工，再汇总交浙江人民出版社审编，然后共同商定选目。由于篇幅限制，选文不到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大部分论文未能编入，再加上编者水平有限，取舍未必恰当，肯定会漏掉一些好的文章，请作者和读者鉴谅，并望多加指正。

黄 源

1982年2月23日

旅居于北京黄寺



绍兴《天觉报》创刊号登载的鲁迅所绘《如松之盛》图
(此件系第一次正式发表)

祝電

(一) 葬葬神州斯民先覺天欲福國賴君警鐸

南社同人祝

(二)

輿論健全睡獅頓覺敬祝
貴報萬歲

秋社同人祝

(三)

民之歌哭瞻君是宣族之輯睦瞻君是賴爲指南針亦
導火線越州生色全國憑藉

淮南社祝

(四)

敬祝天覺出版自由

北京周樹人祝

(五)

利吾民福吾國字字金玉行行鉄血天覺報出版萬歲

杭沈鈞業祝

祝詞

香章力不冠不裁切報所堂堂所以困亦之困而之知國諸天下之令

魯迅給紹興《天覺報》的祝賀電

前 言

一九八一年，全国举行了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胡耀邦同志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代表我们党对鲁迅再一次作了崇高的科学评价，并号召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他说：“鲁迅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的伟大英雄，是文化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士。鲁迅的革命精神和他留下的极其丰富的思想遗产，在他逝世后四十五年间，越来越受到人民的尊重。”我们隆重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就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纪念他为中国人民建树的不朽功勋。”

浙江省是鲁迅的故乡，和全国各地一样，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代表全省人民对鲁迅的崇高敬意，在省委的领导下，由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主持，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特别高兴的是，在杭州西湖最美丽的中心举行了鲁迅塑像的奠基典礼，这实现了鲁迅逝世时党中央在延安向全国提出的一个愿望。同时在鲁迅诞生地绍兴，整修了鲁迅故居。举行了全省性的隆重纪念大会后，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省文联、杭州大学和省鲁迅研究学会联

合举办了浙江省鲁迅学术讨论会，来自全省各地的鲁迅研究工作者一百三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应邀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的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唐弢、王士菁、许杰、林辰、王仰晨、丁景唐等同志，还有来自鲁迅生前活动过的南京、北京、西安、厦门、广州等地的代表。

这本论文集，就是这次会议的产物，现在呈献于本省和全国读者之前，谨请批评指教。

不言而喻，浙江省作为鲁迅的故乡，具有无上的光荣，理应在鲁迅研究上，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为鲁迅终生所瞻望而一生为之战斗的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非常惭愧。但愿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地补上这一课。鲁迅研究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是世界进步人士所公认的，并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实了的。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学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服务，胡耀邦同志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紀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有精确详尽的方向性的指示。鲁迅的从事文学工作和思想工作，目的是改造中国，他随着时代的发展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党的力量，同党站在一起，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目的仍然是改造中国。他晚年

更明确地了解了要彻底地改造中国，从民主革命以至进一步到社会主义革命，指导革命的思想，只能是马列主义，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根据中国国情贯彻马列主义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身上。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早已完成。目前的任务是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四化的任务并不比推倒三座大山轻巧，是更复杂艰巨的任务。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正是为了在党领导的伟大的四化建设中，更好地在各条战线特别是文学、思想战线上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胡耀邦同志的纪念讲话中，每一部分，都精确地概括了鲁迅的革命精神和他的历史的功绩，应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诸如他热切地追求真理，永不停顿地前进，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的革命精神；他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的要求，不顾会遭遇多大的艰险，坚定不移地同人民革命事业共命运的革命精神；他的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宝贵经验；他的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文艺上正确处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在文艺批评上，贯彻“剪除恶草，灌溉佳花”的方针。他的著作中的战斗性及其对人民的教育作用都达到了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他终生工作的勤奋的程度是惊人的。胡耀邦同志所有这些总结性的论断，

目 录

前 言

黄 源

- | | | |
|-----|-----------------------|---------|
| 1 | 鲁迅——实事求是的典范 | 黄 源 童炽昌 |
| 27 | 试论鲁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 蒋荷贞 |
| 41 | 论鲁迅前期民主主义思想的特点 | 哈九增 |
| 65 | 鲁迅早期对尼采学说的利用和改造 | 郭志今 |
| 93 | 论鲁迅一九三六年的斗争及其
斗争艺术 | 史 莽 |
| 124 | 鲁迅论艺术真实 | 钱文斌 |
| 143 | 鲁迅与日本文学 | 孙席珍 |
| 169 | 鲁迅与欧洲十九世纪积极浪漫
主义文学 | 黄育海 |
| 184 | 鲁迅论高尔基与苏联文学 | 陈元恺 |
| 204 | 鲁迅的故乡和《故乡》 | 钦 文 |

221	论《呐喊》、《彷徨》的现实主义的革新性	文心慧
245	封建蒙昧主义和农民的革命性 ——鲁迅小说研究札记	肖 荣
262	典型化技巧的日趋圆熟与提高 ——鲁迅小说艺术发展初探	王嘉良
289	关于狂人形象及其创作方法 ——读《狂人日记》及其评析札记	高松年
307	鲁迅思想飞跃前的一个信号 ——重读《孤独者》	余 涉
326	从《故事新编》看鲁迅思想和艺术的发展	郑择魁
347	试论鲁迅杂文的功力	陈庆英
366	论鲁迅的诗歌创作	骆寒超
391	鲁迅诗歌散论二题	方 牧
407	鲁迅诗新笺	吕漠野
416	鲁迅诗与龚自珍诗	陈 铭
432	《野草》与象征主义	张德强
447	论《野草》中的韧性战斗精神	盛海耕
465	鲁迅对儿童文学的巨大贡献	蒋 风

485	鲁迅与弗洛伊德学说	余凤高
506	鲁迅的自然科学功利观	林 晖
518	关于《如松之盛》画的说明	朱 恣
522	《鲁迅年谱》若干史实补正与质疑 (早年部分)	陈 坚
535	鲁迅收藏的四封阮氏书简考略	
	周芾棠	谷兴云
545	鲁迅与许钦文	钱英才
565	鲁迅与民俗学	吕洪年
576	鲁迅先生与绍兴戏	谢德铤

鲁迅——实事求是的典范

黄 源 童炽昌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特殊的宝贵品格。其中非常鲜明而突出的，就是他的实事求是精神。今天，在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进军的途中纪念鲁迅，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鲁迅充满实事求是的精神

从鲁迅先生诞生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

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这一个世纪却极不平凡地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七十年时间里，政治大事变象雷奔电驰般地一个接一个，人民革命的大风暴一场连接着一场。严峻的社会实践把各种各样的“主义”检验一过，每个登台表演的历史人物也不能逃脱这种检验。

在这种检验面前，许多英雄豪杰只是在政治舞台上显露了几下身手，就被历史的浪潮席卷而去。有的人曾经是反封建的思想文化战士，很打过一些漂亮仗。然而，他们的战斗业绩犹如在夜空中的焰火，五颜六色，闪烁发光，可惜好景

不长，不消片刻，很快就被黑暗的夜晚吞没了。

有一个人却在近现代中国滔滔滚滚的历史潮头把脚跟站得很稳。他是谁？他就是伟大的鲁迅。他一生都跟随着历史潮流前进。从辛亥革命的行列中走过来，终至于转变成共产主义战士的，真是寥若晨星，鲁迅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光复会中人而能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更是唯鲁迅而外，别无他人。鲁迅，他的一篇篇战斗文章，不象耀眼霎时、转瞬即灭的焰火，而是象颗颗永远闪烁的明星，照亮了革命人民的战斗道路，至今还给我们以智慧和力量。

这个事实本身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鲁迅先生为什么能够“走过来”，而且在历史上牢牢地“站住”了呢？他的思想、著作，特别是后期杂文为什么经受得住历史的严峻检验，被公认为是正确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位伟人的血管里流注着实事求是的血液，他的光辉的一生就是实事求是的一生。他是一位实事求是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实事求是的思想家，更是一位实事求是的革命家。实事求是，使他的思想、著作获得了生命的活力，使他在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准确而有力地打击和摧毁敌人。

鲁迅先生的实事求是精神，集中表现在他一贯坚持革命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理论和实际统一。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鲁迅。鲁迅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实践的产物，是中国人民与自己的敌人血战的结晶。鲁迅始终坚持参加革命实践，他的“金不换”的笔，顺时代潮流而动，应战斗需要而写。他从来不幻想飞升，不“超越”时代，不“躲避”现实。他的口号是“为人生”，“为现在”。他始终扎扎实实地站在中国的大地上，为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切

实奋斗。他之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就因为他率领文化新军，在硝烟弥漫的反文化“围剿”的战场上冲锋陷阵。他的对敌斗争的文字，本身就是杀敌的“寸铁”。他的文章又深刻地总结了革命斗争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凝结着许多战士的鲜血。他是为中国革命而思想的，他的思想总是围绕着中国革命，尤其是文化革命的紧迫课题而展开。他的思想同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所包含的实践经验是如此丰富和深刻，从而必然会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坚持参加革命实践，从实际出发，这是鲁迅前期与后期一以贯之的。但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则前期与后期不可同日而语。鲁迅从年青时代起就洋溢着实际精神，他作为一个进化论者却能够得出很多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就因为他坚持参加革命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依据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是他前期毕竟是用生物进化、朴素的发展观点观察世界，这就不能不使他的“实事求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实事”固然是“实事”，“求是”谈何容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求索”的道路既是漫长的，又充满着坎坷曲折。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出路何在？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如此等等，作为进化论者的鲁迅不能从根本上寻到正确的答案，因此有时不能不感到“寂寞”、“空虚”、“彷徨”，陷入“惟黑暗与虚妄乃是实有”的困惑境地。只有当他的世界观跃进到共产主义，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最革命、最正确、最科学的理论来观察世界的时候，他才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真正能够从客观事实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明确中国革命的胜利发

展前途，对未来充满信心。

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他一点也不看轻革命理论的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最明快的哲学”，认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是每个革命者所“必不可少”的。然而，鲁迅先生看重理论，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实际。他最厌恶读死书、死读书，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他把只知死读书、记条文，全然不知天下事的人叫作“书橱”，说他们“一开口就害人”。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前期，正是“左”倾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鲁迅先生特别致力于反对以理论与实际分裂为特征的洋八股、土八股，反对那种只是把理论停留在口头上的革命空谈，反对那种把理论加以绝对化，与实际情况相隔离，生吞活剥，硬搬乱套的学究式态度。他曾经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高谈的“彻底的主义”是把幻想看作真理，或者把仅在将来才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勉强放到现在来做；指出他们企求不经过艰苦战斗和细致工作就轻易取得革命成功，或者企求革命队伍的“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只不过是“乌托邦的空想”。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鲁迅先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但也中肯地指出这次运动“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首先的一点，就是脱离实际，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他说：“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后来，鲁迅先生在同日本朋友增田涉谈到无产阶级文学论争时也指出：“他们对历史是认识不足的，而且没有把握住客观的现实形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鲁迅先生曾大声疾呼革命作家把眼光转

向实际，反复强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必要。他尖锐指出，革命作家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就容易从“左翼”滑到“右翼”。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篇纲领性文献中写道：“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鲁迅先生的透辟分析和热忱教诲，犹如黄钟大吕，给革命文艺家敲响了警钟，具有极为深刻的教育意义。

鲁迅先生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按照许广平同志的说法，他从“1929年起，（源按：实际上是从1928年二月起），三四年间几乎每天手不释卷的在翻看”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后一有功夫也还是如此。”然而，鲁迅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拘泥于熟悉个别词句，而是务求真懂、“深通”，着眼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之深入自己的血肉，化作自己行动的指南。鲁迅先生自己说过，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全部著作和事业都有着浓郁的中国民族的特色。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他那里总是按照中国的特点被应用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分析和回答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文化革命）中提出的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对于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热烈赞赏，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诚拥护，对于中国政局多次变动的分析和预见，和他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文艺与实际生活与群众斗争的关系问题、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文艺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的精辟论述，如此等等，

都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高度结合，都是实事求是的，从革命实际出发，适合中国需要的。除个别文章外，我们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简直找不到马克思主义怎么说，列宁怎么说，但是他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又无一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一点教条味道和书呆子习气。

对比是这样的鲜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军事战线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在白区文化战线上反文化“围剿”却把敌人打得一败涂地。军事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篡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致命弱点是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无论对中国 的社会性质、社会特点，还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一概是若明若暗，漆黑一团。他们自称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懂得背条文、抄书本，认为公式万能，手中根本没有真马克思主义，而只有“百分之百”的教条。而作为反文化“围剿”的主将的鲁迅先生，情形则完全不是这样。第一，他手中有真马克思主义；第二，他有着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对现实的情况又如指掌。这两个方面的紧密结合，就发挥出无比强大的威力。且不说鲁迅如何横扫文坛鬼魅，梁实秋的“人性论”敌不过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胡适的“征心策”逃不脱鲁迅的尖锐批判，即使是比较“朦胧”的“民族主义文学”、标榜“超然”、“中立”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麻醉性颇强的“论语派”，都抵挡不住鲁迅的犀利解剖和致命打击。就以鲁迅反对文化“围剿”的战略战术来说，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毛泽

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鲁迅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例如国民党反动派从1934年初起，把查禁进步书刊改为出版前实行书报检查的极为毒辣的政策。早在1933年11月，敌人的战略转变刚冒头，就被鲁迅先生识破了。十一月三日，他在致郑振铎的信中提到一个特殊的新情况：“前日潘公展、朱应鹏辈，召书店老板训话，内容未详，大约又是禁左倾书，宣传民族文学之类。”潘、朱是上海文化特务的头目，反动的“民族文学运动”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所以鲁迅先生在会议内容未详的情况下，作这样的估计。十一月五日，鲁迅先生进一步掌握了会议的内幕，知道这黑会“讨论”“着重的是在新的书籍杂志出版，要怎样才可以免于禁止。听说这时就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先生对这反动的检查制度产生的具体过程和施行的情况，每一步骤都注视着，掌握着情况。到十一月八日，他就构成了战略性的判断：“看近日情形，对于新文艺，不久当有一种有组织的压迫和摧残，……会有检查制度出现。”（《鲁迅书信集》435页）1933年底，他更明确地断定：“明年是先行检查书报，以惠商民，另结新样的网，又是一个局面了。”（《准风月谈·后记》）从十一月三月初察端倪，到年底下此结论，鲁迅先生反文化“围剿”的战斗犹如毛泽东同志的用兵，是针对敌情，知己知彼的。而在敌人以新的战略猛扑过来的情况下，鲁迅先生不是采取拼消耗、急躁冒进的战法，也不是放下武器，停止战斗，而是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沉着应战。他说过：“有趣的是谈